



燕妮·马克思

波·维诺格拉茨卡娅著

K835.1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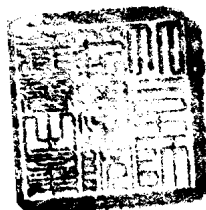
燕妮·马克思

〔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著

高宁哲 赵德成译 李俊聪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14381

П. виноградская
ЖЕННИ МАРК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69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燕妮·马克思

〔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著

高宁哲 赵德成译

李俊聪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227,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1002·569 定价 1.20元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四十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

弗·恩格斯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苏联波·谢·维诺格拉茨卡娅写的《燕妮·马克思》(1969年增订版)翻译的。

燕妮·马克思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终身伴侣和得力助手。她具有勇敢倔强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她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却敢于同“上流社会”的传统势力彻底决裂，并且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把自己的命运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从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革命者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在布满荆棘、危机四伏和艰难曲折的革命征途中，燕妮和马克思携手并肩度过了四十年。燕妮在同马克思的共同生活中，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经受了反动派的疯狂迫害和打击，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她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安慰，对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同时，她也给了马克思巨大的帮助，

为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写作和实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正象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所说：“如果我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末卡尔·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

《燕妮·马克思》一书利用大量史料叙述了燕妮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她所参加的各种活动和斗争。书中还扼要地描写了马克思的生活、工作，以及他的学说和斗争情况。这对我们了解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很有帮助。

总之，本书通过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和严峻的日常生活的考验，再现了燕妮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大完美的形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目 录

致读者	1
青年时代	13
三十——四十年代的德国	33
秘密订婚。结婚	52
巴黎	94
流亡布鲁塞尔	122
重返巴黎。流亡	143
1848年革命	153
流寓伦敦	162
燕妮、卡尔及其子女	204
马克思的秘书	290
恩格斯——家庭之友	334
燕妮——普通人、同志与革 命家	359
国际时期	378
文艺家燕妮	429

晚年.....	453
后记.....	471

附录

燕妮·马克思的书信.....	477
弗·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 讲话.....	487

致 读 者

1968年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体进步人类都隆重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资本论》的作者、第一国际的创建人卡尔·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由于这个纪念日的来临，人们不禁回忆起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她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了解和珍视马克思的伟大天才、他的雄图大略，及其对人类的意义。因此，在这个时候出版一本论述马克思的战友和终身伴侣的书，是非常适时的。

一个人越有才干、越有智慧和

声望，那么越是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的著作和活动，而且还有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亲朋友好……

随着马克思的影响、作用和声望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日益提高，人们必然对他周围的人，首先是对他的妻子和朋友——燕妮·马克思的形象越来越感兴趣。

后来成为著名政治活动家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曾大胆地说：“如果我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末卡尔·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不是夸大。”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美貌出众，富有女性的魅力，同时具有杰出的智慧和罕见的洞察力。这使她能够看出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天才，珍视他特有的才能，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燕妮勇敢顽强，坚定不移。这使她有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以争取同卡尔结合，反对家庭偏见，反对家族的传统势力和等级贵族的门阀观念。

四十年来，燕妮作为马克思的战友和秘书，始终站在第一支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前列。尽管这条道路危机四伏，苦难重重，但她从不动摇，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

甚至象前希特勒政府财政部长，威斯特华伦一家的远亲柳察·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这样的极端反动分子，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根据他在家族档案中看到的燕妮的书信，不得不这样写道：“……马克思一家的经济状况真是糟糕透了，燕妮肩负着无力克服的困难。但是这位女性却找到了良心促使她要做的一切，以及她那富于幻想的心灵所追求的一切。”

可是，把“她那富于幻想的心灵”献给了卡尔·马克思的燕妮，绝不仅仅限于做个热爱丈夫的妻子。她是一个各方面都有教养、智力高超、富有创造性的人，她有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性格。燕妮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如海涅、海尔维格和拉萨尔等都对燕妮的聪明、博学和美丽赞不绝口。

后来，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整个一生都置身于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中，这支队伍早在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兴起之前，就帮助马克思高举战斗的旗帜，在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殊死的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处于繁荣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并论证组织工人去消灭资本

主义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同时又是天才的预见，它确定了未来一个世纪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马克思是这第一批“狂人”的代言人。燕妮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即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中的一分子。继承他们的事业的，是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共产党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燕妮和卡尔·马克思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并肩度过了四十年。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不论是在革命高涨时期蓬勃开展起来的活动，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时期为拯救党的旗帜和残存力量而进行的工作；不论是需要对流亡国外的共产主义者予以救济，还是需要冲破资产阶级出版机关的封锁去出版马克思的天才著作，在所有这些方面，燕妮的帮助始终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感谢燕妮，她把马克思的充满天才思想但又很难辨认的手稿从“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要知道，正是她誊抄了这些手稿的大部分。这些手稿字迹潦草，连马克思本人也无法辨认，而燕妮却把它们抄得清晰而工整。甚至当燕妮上了年纪时，她还经常回忆起在昏暗的小房间里阅读和誊抄这些手稿给她带来的快乐。

她认为这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难道她只是抄抄写写吗？难道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吗？

不，燕妮不仅是第一个读者和缮写员，而且还是第一个顾问，甚至是参与者。《资本论》出版后，燕妮在一封信里指出：“……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她这样说丝毫也不算夸张。

马克思非常重视燕妮的意见。拉法格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证明说：“他不事先听完燕妮的意见和评论，是不会付印任何东西的。”

马克思对燕妮的写作才能和优美的文风评价很高。马克思承认说，他能把妻子的来信反复读十二遍，并认为她是“真正的能手”，特别是在书信体裁方面。在马克思从事政论著作的初期，燕妮曾起过教师的作用，她建议马克思写得轻松一些和自由一些，要马克思相信“他的深邃的思想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这不是偶然的。

燕妮作为秘书，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的各个时期所写的大量的极其重要的通讯稿中，闪烁着她的优美文风、高度智慧和最复杂问题的精湛见解的光辉。

但是，燕妮只是到晚年才有可能独自在文坛

上崭露头角。那是在七十年代，当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们接替了她的秘书工作的时候。这时，燕妮·马克思显示出她是一位有才华的政论家。1875—1878年间，她在《法兰克福报》^①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编写燕妮·马克思的传记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她的全部生活和活动是与马克思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工作融合在一起的，是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只有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燕妮的人格和作用，因为她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与她所服务的阶级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上了。

事件和历史总是通过人去完成的。如果不涉及许多人物（燕妮在他们当中生活、工作和帮助马克思），是无法评价燕妮的。在这些人物中，一方面有马克思的战友、志同道合者或暂时的同路人，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敌人和迫害者；此外，马克思家的大门始终是对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敞开着

的。

如果说脱离开时代，脱离开燕妮·冯·威斯

^① 全称为《法兰克福报和商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自1866年起改称《法兰克福报》。——译者注

特华伦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就难以描述她，那末，离开马克思去单独描述燕妮，就更加困难了。因此，要写一本关于燕妮的书，必须事先描绘出马克思生平的轮廓，而且还必须从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中引用大量的事实。不过，关于这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作者只能作一些片断的叙述，而且只是从阐明燕妮形象，而不是马克思本人形象的角度来叙述。

但是，要从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全部活动中把燕妮所作的贡献划分出来，那是不容易的。

就以他们共同生活的初期——克 罗茨 纳赫、巴黎或布鲁塞尔时期来说，用什么样的历史传记标准能够衡量出燕妮参与马克思的写作活动的程度呢？在那孤独、流亡和贫困的无限艰难日子里，在马克思的极为深刻而光辉的著作中，来自燕妮方面的相互谅解和友谊支持是如何体现的呢？如何把它们区分开来呢？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况且，燕妮的许多书信都已遗失。

例如，不久以前，在1965年8月17日出版的一期《每周邮报》杂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登载了格·龚特尔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燕妮的书信在哪里？》。这篇文章谈到，前面提到的柳察·施

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在他所著的《伟大的火的时代》一书中说，他的祖母伊丽莎白·冯·威斯特华伦，即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第一个妻子的女儿，是燕妮同父异母的姐姐。燕妮和她有过二十多年的书信往来。装有这些书信的厚信夹，曾在施达斯富尔特附近的霍亨耐尔斯勒本城堡内的家族档案中保存多年。

冯·克罗西克伯爵得到了他的姑母——燕妮书信的最后持有人的同意，准备将它们公布于众。但是战争妨碍了这件事。以后，这些书信就无影无踪了。文章作者格·龚特尔曾经寻找这些书信的下落，但至今未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尽管他为此悬赏了五千马克。

摆在我这个燕妮传记作者面前的还有一件困难的工作。燕妮是马克思最亲密的助手，又担负着秘书工作，同时还必须不辞劳苦地照顾孩子和家庭。不把私人生活的帷幕揭开，那是无法编写燕妮的传记的，而在私人生活中，伟大的与渺小的，巨大的与琐碎的，平凡的与日常的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使马克思摆脱繁重的家务，给他创造条件来从事最重要的工作——制定革命理论并用它

来武装无产阶级，燕妮毫不犹豫地肩负起处理全部日常生活的重担。但是，在警察迫害、屡遭驱逐和极端贫穷的条件下，履行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职责，同样是一种英雄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特别是，燕妮在肩负着这副重担的时候，一刻也没有中断过自己的秘书工作和党的工作。传记作者不应该忘记，燕妮和卡尔·马克思首先是革命者，他们终生都奉行这样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当必须对党和无产阶级的义务与对私人生活的义务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从不动摇和犹豫，总是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

因此，在谈到马克思夫妇的私人生活时，注意限度和恰如其分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要讲究分寸，考虑周到，才不致贬低主题。

* * *

作者在二十年代写作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传记时，走的是一条前人尚未走过的路。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专门论述燕妮·马克思的资料，只有散见于论述马克思的专题文章中的个别词句，和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旧报刊上的一些短文。